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王 瑶 主编

中国文学研究 现代化进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学术史丛书/陈平原主编)

ISBN 7-301-03593-4

I. 中… II. 王…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书 名: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

著作责任者: 王 瑶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593-4/I·45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35.5印张 549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43.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小 引

陈平原

这是一部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真正完成——的著作。

任何著作都有遗憾，而此书因主编王瑶先生的过早去世，留下的遗憾便显得格外突出。虽说王瑶先生再三强调尊重各章作者的学术个性，可全书的整体设计因先生去世而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却是无可讳言的。

原来设想各章初稿完成后，大家互相切磋，再参照先生概述这百年学术思潮的“前言”，做适当的修改。可风云突变，先生允诺撰写的“前言”没能来得及动笔；好在课题组同人不负众望，先后完成各自承担的章节。如今汇总出版，综论性质的“前言”只好付诸阙如；另由我这跑龙套的说明一下写作经过，权当“小引”。

二

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中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引发出此后的研究计划，也可说是此书的胚胎，故全文引录如下：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的范围及概念都十分驳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鲁迅慨叹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我们可以加一句说，有史自鲁迅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情况固然如此；但即使过去很受重视的书如《诗经》、《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中收了那么多关于《诗经》的著作，但很少有取得突破的书，只是到了胡适、闻一多等人那里，才开创了新的局面。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点无论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是从具体的学科建设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先生说,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完成,可他精力不济,无法独力承担;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愿意参加,他可以领个头。我当即表示很感兴趣,建议写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或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学术史著作。先生又征求了好多师友的意见,越聊越得意。到第二年夏天我帮着填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时,先生已恨不得马上动手。只是碍于课题组成员还没能完全进入状态,才稍为耽搁了一下。

原先申报研究项目时,课题组除先生作为负责人外,还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六位中青年学者。听完先生畅述研究设想后,发现不少题目非课题组成员所能撰写;于是改为聘请学有专长的专家就其熟悉的题目撰稿。为了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撰稿人,先生可谓费尽心机。那阵子只要学界友人来访,必谈此事。我因常到先生家走动,发现他几乎每天都有新想法。所谓“发起凡例”,实非易事;后人习以为常的东西,草创时却需披荆斩棘。若只选六七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那倒好办,大家意见相对一致;可先生认为这样不足以体现这百年的学术变迁。而选二十家可就麻烦了,因同样“级别”的学者颇多,取舍不容易。单是为了确定这“二十家”,先生写信、打电话乃至上门拜访,不知征求了多少专家的意见。先生有的从善如流,有的则“固执己见”——因其代表了先生的学术追求,旁人不一定能够理解。

至于寻找研究者,也非易事。一来学术史研究并非独立学科,历来不受重视;二来完成此课题需有古典文学和现代学术思潮两方面的兴趣和知识积累,合适的人选不多。先生斟酌再三,举棋难定,直到与所有拟议中的撰稿人交谈过,并获得某种理解和心灵契合后,才舒展了眉头。

1988年元旦刚过,先生就迫不及待地镜春园家中召开第一次课题组会议,陈述他的研究设想,并征求诸位撰稿者的意见。那天先生情绪特好,谈笑风生,说这是他平生最后一项学术事业,也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在这次会议上,约好年底前各自拿出初步的写作大纲,以便互相交流,使全书具有某种整体感。

这年的11月，课题组在北大勺园开会，讨论全书体例和各章提纲。先生再次陈述其研究设想，并对每位撰稿者的写作大纲提出具体意见。先生事先做了相当认真的准备，其批评大都让当事人出一身冷汗。看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课题组同人纷纷要求先生早点把概论性质的“前言”写出来，以便各位撰稿时参阅。可先生说只能“同步进行”：正是在与诸位的争论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自己的想法的。

本来约定第二年10月完成“前言”和各章初稿，然后再次集会讨论近百年的学术思潮。可1989年春夏之间的政治变故，使一切都落了空。最初的动荡过去后，先生隐忍悲伤，多次与我商谈此书的撰写情况。当时有人怀疑此书的价值，断言即使写完也无法出版；也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希望退出课题组。大概是见多了风浪，先生处变不惊，反而更坚定了完成此课题的决心。先生去世前半年，虽有各种干扰而难得平心静气读书做学问，可只要提及此课题，先生那明显苍老了的脸上马上容光焕发——这毕竟是先生学术上最后的冲刺，怎能不牵肠挂肚！

可惜天不如人愿，先生最后还是没能见到此课题的真正完成。先生去世后，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委员会依照规定征询是否撤消此课题，课题组同人多表示愿意继续工作。于是重新调整了布局，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全凭各位撰稿人的学术良心。只是物换星移，协调起来更不容易；虽经再三努力，最后定稿时间仍一延再延。惟一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这事情总算没有半途而废。

三

先生生前多次谈及此书的研究设想，只是当时以为先生会写成正式论文，故没有认真记录。除了上引《学术动态》上的发言外，手头只有一份“研究项目申请书”和一张为讨论会报告所拟的“研究设想”，二者虽都是由我执笔起草，可基本观点属于先生。以下根据这些相对零散的材

料,略为介绍先生为此书设计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

从黄宗羲写作中国第一部学术史《明儒学案》以来,产生过不少总结一代学术成就的著作。这些著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后学很有帮助。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颇多建树,值得专门总结。一百年的学术史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传统”,对这一传统的隔膜与误解,很容易产生虚无主义态度或热衷于横扫一切的偏激。每个人都不愿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都想重起炉灶,都重新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摸索,而不曾很好地借鉴前辈的经验教训,这是近代以来学术思潮迭起,但都匆匆过场,热闹有余而成就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认真研究这百年来的学术实践,为今人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学术规范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因此,本书选择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近二十位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探讨他们在借鉴西方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以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治学精神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总结其学术成就。

本书之选择研究对象,不以学术成就为惟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因此,不准备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等很有学问但治学方法比较传统的学者。不选不等于否认其学术成就,而是为了突出我们的学术追求。表面上一系列的个案分析,实际上贯穿着我们对这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过去的学术史主要讲师承渊源,讲学术成就;而我们则必须回答如何协调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矛盾。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者的眼界;另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往往是根据西方学术发展总结出来的,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不免有隔阂。食古不化的固然没出息,一味照抄西方理论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有可以作为借鉴的先贤的足迹。本书的任务就是帮助读者辨认这些足迹。

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然立足于个案分析,可着眼的是学术思潮的变迁。通过对这二十位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在具体论述中,学者的

个人经历只作为说明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辅助材料。也就是说,本书的主要着眼点在学者的治学成就、研究方法及其代表的学术思潮,而并非提供面面俱到的若干学者的生平资料。这需要理论眼光和问题意识,而且需要明确史家的立场。尽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对象的学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为尊者、贤者讳,更不想写成怀念文章。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谈郭沫若不能不谈晚年的《李白与杜甫》,不是专门揭短,而是展示学术道路的曲折坎坷。

本书侧重于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考察,但旁及其他人文学科。中国人做学问本就文史哲不分,而方法的借鉴、资料的融通以及学科的拓展等,都不是局限于文学研究能够说得清的。一来力求更准确地描述大学者的出入于史的治学生涯,二来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作为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侧面来理解和把握,这样,才可能真正摸到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当然不想弄得汗漫无所归依,可也不能只盯着文集中那几篇诗论或小说考证。治史讲究识大体,这“大体”就是百年学术思潮的大趋势。有此眼光有此见识,再结合具体对象的深耕细作,方才能不辜负这课题。

以上复述王瑶先生的研究思路,虽则自信大致不差,可一经转述必然口气有异。为了慎重起见,这里一概不加引号。

四

当初承接这一课题时,王瑶先生相当自信。理由是在中国学界,像他这样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深厚学术积累的学者很少。且先生亲承朱自清、闻一多二师教诲,又对鲁迅的学术思路别有会心;至于游国恩、孙楷第、俞平伯等,更是介乎师友。先生私下里不只一次说过:想来想去,我确是最佳人选,只好勉强再“老骥伏枥”一回。

正因为先生是从事这一课题的最佳人选,也给此书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谈论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为何只及古典而不及现代,

难道身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的王瑶先生也厚古薄今？要说开拓学术领域和更新文学史观念，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乃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不少人于是提议为先生立一章，以便更好体现这个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嬗变。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是叼着烟斗，不无得意地连连摆手：“不行不行！那不成了王婆卖瓜了嘛！”先生去世以后，又有几位学者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从已经发表的论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中选一篇作为附录。考虑再三，为了尊重先生的意愿，决定保持原来的框架和章节不变。

需要说明的是，先生最初拟定的章节中，除收入本书的外，还有另外四章。阿英一章由于我再三陈述理由，先生同意删去。冯沅君、陆侃如一章（陆、冯夫妇有些著作系合撰，故并为一章）因来稿不大理想，只好割爱。至于钱钟书、刘大杰两章本不能缺，可撰稿人最终没能完成，也只能徒唤奈何。缺了这三章当然很遗憾，起码使得全书显得有点“残缺不全”。可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以“残缺”示人。“二十家”云云本也只是取其代表性，无意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或许，正因为“残缺”，使此课题成为开放的空间，召唤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若如是，则真的是“塞翁失马”。

转眼间，先生去世已近四年，这期间经历诸多风浪，课题组同人仍能坚守学术，完成先生遗愿，这点实在不容易。尤其是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范宁先生不顾年老体弱，第一个交来其负责撰写的章节，对我辈后生更是无言的催促。另外，在此书的酝酿及撰写过程中，还得到许多不便一一列举姓名的师友的大力帮助，谨遥致谢意。

最后有两点说明：

一、本书的审稿工作由孙玉石、孙静、钱理群和陈平原四位负责，基本只作技术性处理，或提意见请作者自己修改。

二、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也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特此致谢。

1993年11月22日于东京白金台

目 录

小 引 陈平原/

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 夏晓虹/1

- 一 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1
- 二 科学精神/6
- 三 文化视角/20
- 四 历史意识/35

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奠基人

王国维 刘 焯/51

- 一 中西文化交流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境界/53
- 二 《红楼梦评论》的开创性/56
- 三 《人间词话》划时代的成就/61
- 四 中国戏曲史的拓荒者/67

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 陈平原/71

- 一 专著与杂文/71
- 二 清儒家法/74
- 三 文学感觉/80
- 四 世态人心/86
- 五 学界边缘/92

吴梅在曲学研究上的贡献 王卫民/103

- 一 指导实践的曲律研究/104

- 二 总揽全局的曲史研究/109
- 三 促进了人们戏曲观的转变/114
- 四 取得成就的原因/118
- 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 刘梦溪/124
 - 一 工具·材料·观念·方法/125
 - 二 打通文史 追求通解通识/129
 - 三 中国文化本位思想/132
 - 四 种族与文化的观点/142
 - 五 独创的阐释学/153
 - 六 中国文体论/166
 - 七 真正“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现代学者/174
- 胡适的文学史研究** 陈平原/192
 - 一 从“大胆假设”到“小心求证”/194
 - 二 双线文学观念/198
 - 三 历史演进法/205
 - 四 《红楼梦》自传说/211
 - 五 整理国故思潮/218
- 郭沫若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 孙党伯/234
 - 一 中国新诗的奠基者/237
 - 二 经过改装的泛神论/239
 - 三 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247
 - 四 中国古史研究的开拓者/258
 - 五 古史研究的突出成就/263
 - 六 结语/269
-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董乃斌/277
 - 一 绝不旁骛的学术追求/278
 - 二 先驱者的足迹/280
 - 三 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285
 - 四 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剖析/289

- 五 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为中心/294
- 六 “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299
- 七 “一时风气”之制约/302
- 八 将批评史推向更高境界/307
- 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 杨 铨/313**
 - 一 建立在版本目录学基础上的小说戏曲研究/314
 - 二 泛读群书与专题考辨/325
 - 三 余论/331
- 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述略 李少雍/334**
 - 一 职业与娱乐/334
 - 二 诗歌史研究/336
 - 三 批评史探讨/339
 - 四 《诗言志辨》/341
 - 五 小处下手与大处着眼/344
 - 六 语文学与考据学的融通/347
- 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 范 宁/354**
 - 一 少年精神与文学研究/354
 - 二 新资料、新方法与“新的观点”/356
 - 三 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为毕生精力所在/369
 - 四 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378
- 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游国恩 沈玉成 高路明/380**
 - 一 一举成名的《楚辞概论》/381
 - 二 古史与楚辞的互证与互释/388
 - 三 西南文献和汉魏六朝诗文/396
 - 四 凝聚毕生心血的《楚辞注疏长编》/401
- 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独创性 刘 焯/409**
 - 一 唐诗研究的新开拓/410
 - 二 以诗的眼光研究《诗经》/415
 - 三 《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419

- 四 探求中国神话的体系/423
- 五 研究方法的独创性/425
- 俞平伯学术成就简论 刘扬忠/431
 - 一 新园花月一时新/431
 - 二 《红楼梦辨》之诞生/433
 - 三 “以文艺之眼光读《诗》”/440
 - 四 趣味说与鉴赏学/445
 - 五 俞氏红学的功过是非/454
 - 六 迹浅而意深的诗词研究/456
- 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 施议对/468
 - 一 治学求索三阶段/469
 - 二 词学考订、词学论述与词的创作/476
 - 三 一代词宗/483
- 吴世昌的治学道路及贡献 刘扬忠/487
 - 一 为文学史研究建立牢固的基础/487
 - 二 多方面的大胆探索/495
 - 三 探本求源的《红楼梦》研究工作/508
 - 四 唯真唯实的词学研究/515
- 王元化的文学观念与学术思想 劳承万/526
 - 一 探索文论的新形态/526
 - 二 艺术特征论/530
 - 三 艺术认识论/539

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

夏晓虹

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

科学精神

文化视角

历史意识

一 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梁启超(1873—1929)可算得上是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1929年当他病逝时,他从政或讲学时的敌人或朋友均同声致悼,而公祭大会上张东荪“知惟《春秋》,罪惟《春秋》”的挽联语,更预示了对梁氏的不同评价将从生前延续到死后。

不过,对梁启超一生活活动时期的划分,其时众人倒是大体趋同。最先面世且有相当分量的三篇纪念文章中,张荫麟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将梁氏一生智力活动分为四时期:

第一期自其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歿,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1]

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也采取此四段式,只分别将一、三两时期称为“政治生活时代”,二、四两时期称为“著述时代”,内中再标出第一期与第二期^[2]。各家的评论,则以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所言最精当:

第一二期之宣传较浅薄,而影响最大。第三期之从政最失败,而帝制一歿厥功为伟。第四期之讲学较宏博,而收效最微。^[3]

惟张荫麟从学术史着眼,对第三期评价尤低,以为梁氏“一生最不幸之时期”。其实,时期的区划,在梁启超生前已有定说。1925年,其侄梁廷灿编辑《(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时,作《序例》一篇,即明白宣示该书共分五集,除第五集为附集,收题跋、诗词等,前四集之分割,正是依照“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居东瀛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迄甲子冬作”安排的。梁启超本人对此说自然首肯,以后论家也大都据此发言。

而如果同时兼顾学术与政治,或者说,将政治活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考虑在内,则以上四时期的划分实可合并为二,即以1917年底梁启超脱离政界为前、后期的分界线。

尽管少年时代梁启超接受的是旧学教育,从四五岁开始念“四书”“五

经”、习中国略史,直到15岁入阮元创立的具有乾嘉学派传统的广州学海堂,曾不知天地间于帖括、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问;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终究影响到出生在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海陬乡间的一介书生,使梁氏于科举仕宦或下帷研经这两条前辈学子无数遍重复的人生之路外,更有了新的选择。1890年春,年方18却已有举人头衔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归来途经上海,见到江南制造局译出的西书若干种,心甚好之;并购得徐继畲所著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一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同年秋,梁氏拜谒了以布衣上书请求变法不达南归的康有为。康“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又“教以陆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令梁氏大为倾服,遂“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师从康有为,成为次年开设的万木草堂的第一批弟子。随着列强鲸吞中国而发生的“西学东渐”,经由获读新书与请业康门,开始作用于梁启超。尤其是后者,塑造了梁氏一生问政治学的基本品格,故自诩“生平知有学自兹始”^[4],实为肺腑之言。

1920年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启超曾反省前期其师徒二人“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的偏颇,同时也承认,由于他“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嫌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对二人之学术师承做了颇为公允的总结。梁氏受教学海堂先人为主的考据学根基,原与“专求其微言大义”、意在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大家康有为学统不同;后者为标举主张而“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的治学路数,悖逆于讲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汉学家法,更令梁氏无法认同。因此,批评康有为之学“犯科学家之大忌”、“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自言“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5],便是梁启超从清学正统派立场自然做出的反映。并且,最初隐伏的学派之争,最终也导致了二人政治、学术的分途。不过,在梁氏前期,这些歧异尚属“末流”。甚至在对康有为极为崇信的戊戌前数年间,他对旧学之一部分的考据学也会持极为严厉的批评态度:“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6]而自居于新学家之列,参与《新学伪经考》的校勘,分任《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对康氏学说精髓的领悟与信服,仍然是梁启超此期求师问道之大节。康有为借辨伪经而打破思想专制,借说改制而倡

导社会改良,其书中充溢的切近现实、以经学为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时代精神,与康氏强悍的学风融为一体,强烈地震撼与吸引了梁启超。康有为杂糅中西的授课内容,也刺激了生性好求新异的梁氏对西学的兴趣,并成为其日后致力于输入西方学说的萌芽。与政治革新及世界潮流如此巨大而生动的场景相比较,考据方法于是成为小小不言的枝节,被投身于改良运动的梁启超自觉地搁置起来,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传统也因此再度张扬。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虽随同其师从国内政治舞台上消失,由《时务报》造成的政论家身份与热情却依然保持不变。从当年12月创办《清议报》开始,《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的先后出刊,展示了梁启超饱含政治家意识的主要著述成果。评议时政之外,撰写西方思想家学案以介绍各种新学说,批判中国旧学及专制制度,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新民”理论,推行突破传统束缚的文学改良运动,梁氏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以改良群治为依归。到1912年归国后步入政界,无论与执政者合作抑或交锋,梁启超到底已由“理论的政谭家”进而为“实行的政务家”^[7],直接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层面操作。表面看来,若论“经世致用”,当以此时距梁氏的期望值最近。然而除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一役,国人对其政绩实在少有许可。个中原因不必多加探究,却足以使梁氏自省他并非合适的政务家人选。梁启超一生总在为“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而苦恼,也曾经自我设计调和二者,“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8]。至少,在其前期,清政府的腐败与外患频仍以及推翻帝制后的政权重建,都有理由使梁氏对政治活动更为热心,其学术研究因此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与政论色彩。而凡属无补于时局、纯粹出于学问兴味的考证,偶一涉足,梁氏便不免自责为“玩物丧志”^[9],心中不安。而从赴日初期鼓吹激进的破坏论,到归国后赞同共和制,梁启超与认定君主立宪终身不改的康有为在政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其报刊舆论家的声名也早已于康氏之外为自己确立了独立地位。不过,在思想的潜流中,康有为的影响仍然深固。以学术为政治的补益、以西方为中国的借鉴,都可见出康氏的启动之功,尽管梁启超比其师走得更远。

迨到1920年3月欧游归来,听到西方社会关于“物质文明破产”、“中国文化救世界”的议论,已经退出政界的梁启超深受启发。作为一名转向著